



商海炼狱

张石山 著

商

海

炼

狱

中国青年出版社



张石山 / 著

商海炼狱

(京) 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商海炼狱/张石山著.-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3

ISBN 7-5006-3230-4

I . 商… II . 张… III .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7099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0.5 印张 2 插页 233 千字

1999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15.10 元

目 录

第一 章	“海滩” 上的自语	(1)
第二 章	“旷野” 里的奔突	(20)
第三 章	“陷阱” 边的祈祷	(35)
第四 章	“丛林” 中的探寻	(55)
第五 章	远征莫斯科	(73)
第六 章	鏖战天津卫	(91)
第七 章	失策红崖底	(110)
第八 章	兵败匈牙利	(131)
第九 章	讨账北京城	(153)
第十 章	讨账北京城 (续)	(171)
第十一 章	赋闲南华门	(188)
第十二 章	情钟俄罗斯	(203)
第十三 章	情感大结局	(220)
附：	访俄纪略	(286)
后 记	无价码的清贫	(330)

第一章 “海滩”上的自语

写作本书及如此标题之缘起

大约从 1989 年后半年开始，我就不怎么写东西了。王蒙先生有引起争议的一篇作品叫作《来劲》，可惜我没读过，耳边厢只听见吵得热闹。那一段，我只是觉得“没劲”。写小说没劲，搞文学没劲。骨子里的无聊抵触着某些时候的冲动：我名曰作家，且是专业作家，且被评为一级作家，是否该写点什么呢？是呵，写什么呢？有什么用？有多大意思？结果，频繁的冲动只如同颤动的弹簧的些许惯性，愈动愈弱，渐渐趋于平静。懒得去做却又强迫自己去做的事大约就是最无聊的了，比如开会，比如排队。

写小说没劲，干脆便不去写它。“春恨秋悲皆自惹”，不写小说，省却许多烦恼。但闲着岂不更无聊？傻吃憨睡，什么时候熬到进火葬场呢？骑单车去赴酒宴，曾撞在马路隔离墩上，裆部要害物撞得青肿如刚下架的茄子，没撞死；酒宴过后，几个酒友乘汽车下忻州，石岭关出了车祸，车架撞回来挤住我的肚子，撞着路边的电线杆粗细的杨树，树皮全部飞走如剥掉内衣的裸体女人，同车的女诗人伊蕾撞断了手腕，我却偏偏毫发未损。“天不灭曹”，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活着便要吃饭，还想吃一点珍馐美味，谷糠和“社会主义的草”六十年代品尝过不

少，早已吃得怕怕的了。况且上有老而下有小，我虽够不上“二十四孝图”中大孝子，愿老人安度富裕愉快的晚年的心意还满强烈；一儿一女视若掌珠，更无疑乐得为他俩做牛变马，使儿女有快乐的“马背上的童年”。为儿者尽孝，为父者尽责，孝道和责任并不全在钱财，钱财却笃定能够利于尽孝利于尽责。那么，不写小说文章，连很寒伧的一些儿稿费也不去赚，全家老少喝西北风吗？

前十来年间共写写划划发表过几百万字，收集成册者约有一百来万。其余文字编几本小说集、散文集、诗集乃至评论集，换一些稿费来花也不坏，不料，出书困难。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一些发表过的作品偶尔翻看，自我欣赏一回，觉得实在不坏，怀疑这样的好文章怎么竟能写得出来！出版社不肯拿去出书，电影导演、电视台领导不赶快高价买去拍摄，简直是有眼无珠。转而又想，文章写得太好，曲高而和寡。人人都喜欢，那不成“下里巴人”了吗？某某人的诗集，中学生们争相传颂，那艺术层次也就可想而知了。当然，也有识货人，西影长影包括北影曾有著名导演新潮五代看上过我的几部中篇，怎奈命运作梗，历经种种波折磨难，电影电视都不曾拍得半部。简而言之，求神拜佛盼天下雨，行雨的龙们不知何处旅游去也。妄图以旧作出书改编来换钱花的计策未能奏效。缺钱花，工资太低的问题得不到缓解，想挣钱的愿望时弱时强、愈来愈强，百计驱除不去。

因而决定下海经商。

文人经商，恰如刑满释放人员跑单帮，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人皆可为尧舜，他人可以做生意发大财，文人自命脑瓜灵动能反而不会赚钱吗？但问题首先不在这儿。文人多半有一些儿

名气，算个什么人物的啦！比如本人，因为风流韵事一夜晚景所谓作风问题住了一回看守所。那其实也是人住的地方，脏一点、挤一点、饥寒交迫一点、“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一点罢了，却闹得满城风雨，几乎尽人皆知。好心的朋友为我担心，恶意的相知人心大快，名气无形中起了不可小估的宣传广告作用。有朝一日，有什么刊物乐意约请我写一部关于住看守所的见闻录，我相信这家刊物一定能收到一部极其出色的作品——且说我想要经商做买卖，大约也是因为名气作怪，当下便又传说多多，在我省文学界大小算一则新闻了。有传说我赔了钱栽进去一百多万的，有夸赞我赚了钱已经到手几百万的。种种传闻，热闹非凡，连我听了都好生兴奋，觉得自己果然算个人物。

承蒙抬爱，口头传说之余，有文学出版界同仁便盛情约请我写一点关于如何下海经商赚大钱的文章。这就更加说明我之经商毕竟有点新闻性，而朋友们不愧编辑行家，捕捉信息快捷，闻风而动，撒网下钩，前堵后截，决心打捞一条鱼虾之类。看来，我是难以漏网的了。

开始，我曾经试图拒绝。做为专业作家我几年不怎么写东西，开始经商了反而又玩开文字，这不是发神经吗？况且，几年来众多刊物报纸的约稿信件和电话也极多，我是一律不予理睬，固执如一匹驴子。好比戒烟坚持了若干时日，碰到一支元首阶级抽的熊猫牌怎么便可以破戒呢？然而，这次约稿非同小可。编辑朋友青眼有加，何况我们交情匪浅。而人是不能不讲交情的。林语堂先生的著作我随便翻看过一些，记住他讲的第一句话是说：“不近人情者即是大奸大恶。”

于是，有所犹豫之后，答允写稿。因而，关于我个人如何

经商，怎样“下海”，洋洋洒洒实话实说自我交待夹叙夹议，就有了这部书稿。

自己写自己，其实多少靠拢“自传”。不过，自传或自传性文字我曾写过一点，作为文学爱好和创作道路方面的内容，贩卖过若干。眼下，我之经商就我个人认识，即心即佛，砍柴挑水亦是求道过程。但以我先前搞创作而获得的外在身份名位而言，经商亦可算一种“别业”。于是，这部作品可以称之为：张石山别传。

而且，砍柴挑水全是求道，那砍柴挑水的具体过程往往并不轻松。以我们从事文学创作者的素养来衡量，距离固然能够达到审美，当我们处身其中，所谓身体力行的当口，却往往如牛负重，甚至头破血流。人所面对的现实，时时考验着人的皮肉与灵魂。换言之，人生过程恰似一座炼狱。生活在锤锻人格，生活在拷问灵魂。

所以，这部以我这样一名原本是作家的人的经商历程为主干写就的书稿，宜于名为：《商海炼狱》。

祖上遗传而有经商细胞之推断

我祖籍山西盂县，幼时在祖母身边生活的村庄叫红崖底。十几丈高一堵红岩绝壁，下边坐落百十户人家。穷山恶水，丑妇愚民。自我记事，单干户而互助组，合作化而公社化，村民只是种地，背着日头欺负土坷垃，没有一户人家经商做买卖。庙会集市，农民采买一点农具衣食日用，也极其谨慎隆重，生怕受骗。买一只马蹄表，讨价还价希望能加一点添头，搭一疙瘩手表。手表偏偏更贵，“这么点点大有这么贵？”摇头摆尾只是

不信。过年必须买一张麻纸石印的灶王爷，因为那上面还印着历头节气之类。小贩卖二分钱一张，怀疑他进价只花了一分钱。有的农民便不肯在镇集上买，甘愿步行四十里进城去请那一分钱的灶王爷。谁要笑话他为一分钱跑腿，他便拧过脖颈来反问：“我不跑腿，你肯白给我一分钱吗？”说他不够磨鞋底钱，他会回答：“在村子里呆着也不是扛了脚板子走路！”或有也想省一分钱的主儿，托他捎一个灶王爷，他更不干，话又绕回来：“凭什么我磨鞋底为你省钱？”那么，他能否多买一些回来，加价出售，赚一点利润呢？那简直就是侮辱他：“去屎吧！咱老老实本分，可不能做那号事！”村人商品经济观念大略可见一斑了。

然而，这只是我一己之见闻，只是特定地域特定历史年代之状况，如果我们的视界更为广远一些，我们将会察看到另外若干史实。

中国漫长完备的封建社会，汉唐称为极盛。“丝绸之路”为标识的国际贸易曾辉煌千载。宋代有人类史上最早出现的货币“交子”，“清明上河图”为反映生活场景真实的艺术再现之典型，给我们绘制出当时封建商品经济发达繁荣的图景。明清以来，晋商名满天下，票号广设于异国。作为山西人，吃醋部族的后代，我身上能多少无有一点经商细胞吗？

而事实上，我们贫瘠的盂县近代也多有经商的生意人。清代北京为皇宫染衣物的许多染坊皆是盂县家开设，河北平山阜平等临近县份店铺商号多是盂县家当掌柜。在那几县，至今都称赞“盂县人会做买卖”呢！作为地道的盂县人，我难道不该会做买卖吗？

清朝末年，我的太祖父曾是我县最大一家铁铺“铁生金”字号的大掌柜。太祖父生有两子，长子名“得意”，次子名“占

意”，两个儿子的取名记载了太祖父经商做生意当掌柜的关键事迹。长子我的大爷爷曾在平山县做过掌柜，不过字号规模小得多了；次子我的亲爷爷排行第二，承继祖业地位不利，只落得村中种地耍耙子。太祖父当掌柜，认为种地没多大进项，只买下二亩半地做坟茔。我的爷爷因而地亩太少，偏偏他和我奶奶又连连生出七个儿子而人口太多。到八路军打下江山闹土改，我家便轻而易举得了一个儿孙们谢天谢地的“贫农”封号。

——我的外祖父也是贫农，但他的父亲却当过掌柜。我曾有过一些非专业性的调查：我村众多贫下中农祖上多数是地主或商人，至少也是富裕农民。这能说明什么呢？“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固然是一方面的规律；更显在的原因则是鸦片战争以来，外强侵入，割地赔款，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遭到可怕的破坏了。封建化的商品经济及多少萌芽性质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与相对成熟的正牌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竞争中彻底失败了。煊赫一时的海内最富的晋商节节溃败，只剩了“山西人会做生意”一些儿空名头受外地人奚落嘲弄……

且说我的爷爷，地少人多，赤贫如洗，一窝红猴儿嗷嗷待哺，如何生计？我那爷爷却是一位乐观主义者。在村中民间自乐自娱的戏班里，他是打板的鼓师，精通多部曲牌，熟记多折戏文。我二伯会唱《杀狗》。三伯当过《白蛇传》中小生许仙。罗锅五伯甚至扮过旦角儿，会一出《藏舟》取那渔家女胡凤莲。最是四伯出色扛着草台班的正生头牌。——我想，鄙人爱唱歌而会跳舞，音准节奏均不很差，该有遗传因子作怪吧！

“饱吹饿唱”，会打板唱戏不能解决肚皮问题。我的爷爷另有谋生本领：善赌。丢骰押宝，心机非凡。无有赌资，他就在村中赌局替庄家做宝，赢利后抽取红利。抓赌的来了，赌局一

哄而散，待重新开盘，我爷爷能够将前几宝几十位赌客各押多少宝金，分别押了什么，赢若干赔若干，一一回忆清晰，了无差错。赌客人人敬服，庄家乐得请他主持宝局。据我父亲说，我爷爷由于人品端方，脑筋灵动，村中公益事业，如打坝垒堰、建庙办学之类，多要请他总管工程。组织员工、预算结账，统筹得法、刀割水清。记账算账不用笔纸珠算，腹中千条账，嘴里一口清。赌局红利外加工程薪金，勉强维持家口不至饿死。——我想，本人酷爱麻将牌之类游戏而记忆力也颇超常，自信不必种地也能养家糊口，这或者又是遗传的功能。

爷爷生有七子，家父排行老六。老六五岁拾水六岁砍柴自不必说，十四岁打短工，十六岁扛长工，到底悟出：家贫无地，受个半死，落个半饱，总得另谋一条生路。十八岁上与村人结伴来太原府闯江湖，一头扎进脚行扛开了麻袋。扛麻袋一月吃穿之外能挣十几块钱，胜于扛长工每月两块钱多矣。同样卖苦水，收益却有不同。机遇赶得不坏，为人处世品格扎硬，老六十九岁上就当了脚行的大工头。我的中篇小说《脚行》（载《黄河》1991年第二期）描述老爷子当年风采甚悉，在此不赘。需要多说几句的是，我父亲1944年加入中共地下党，为掩护地下工作，晋冀二分区城市工作部出资一半我父亲出资一半，在太原市南肖墙开办了一家店铺“贤德胜”。我父亲公开身份一是脚行工头，二是“贤德胜”东家；隐蔽身份则一是脚行地下党支部书记，二是“贤德胜”掩护下的地下交通站站长。我曾设想在《脚行》中篇之后另写一两部中篇描述父亲的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然而至今没有动笔。在这篇文章中我可以先行大书一笔的是，我父亲当年是经过商做过买卖的，而且出有资本，担任东家。由于有“贤德胜”经商之历史，开设店铺之经

验，解放后中国尚未完成所谓“社会主义改造”那几年，我父亲在南肖墙和平剧院西侧开设了一家裁缝铺，名曰：中华国旗店。经营一两年间，拥有机器十几台，雇工十多名，注册资金数万元。家父当年刚满三十岁，经营有方可见一斑。那正是“文革”中批判的刘少奇号召发展资本主义的几年。我们可以设想：假如从五十年代初期，中国就搞改革开放，大力推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亚洲也许就不仅仅只有四条小龙，遥远的东方会出现一条真正的巨龙！

说来可惜，我父亲经营的中华国旗店正当蓬勃发展将有更大作为之际，解放初期著名的“三反运动”也很蓬勃了。老爷子被开除了党籍，打成了“大老虎”，关其禁闭，迫其退赔。也许可以利国利民利己的中华国旗店被取缔消灭了，也许可以成为一名大企业家的父亲转眼一文不名而只变做人民的“罪人”。后来，他只做为一名拉排子车的搬运工而卖苦水挣工资，他的超人的聪明才智大多用在棋盘上；老爷子如今年过七旬尚能背诵象棋残局一百多盘，有的残局往来冲杀不下数十招呢！

值得庆幸的是，我父亲晚年退休，欣逢改革开放大好政策出台。先是买了汽车回乡去搞运输，我的几个堂弟学到了技术娶到了老婆，自然也挣了钱。数年前，老人家卖掉汽车并贷款数万又承包了山坡荒地数百亩，种下木材树将近十万株。比之于农民“春种秋收”的以一个自然年度为承受限度的经营种植心态，他的敢于“十年树木”动用款项数万的作为堪称大胆，有点子气魄。

有父如此，血脉流传，我身上能没一点儿经商挣钱的细胞吗？耳濡目染，我能不少从老爷子的经营活动中学到许多启发和暗示吗？回顾至此，我便可以断言：谈及经商，我的先天

不薄，遗传因子具备，无有血统障碍。问题只在于我自身。敢不敢经商？肯不肯经商？会不会经商？

打破思维定势经商动机之强化

小时，祖母外祖母给我讲过数不清的故事。有一类故事是讲因果报应的：有现世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施舍了几文钱，结果收获了金山银海，打伤了一个小动物，被大动物咬去了脑袋之类；有来世报，今生欠债，来世转生一匹驴子替债主拉磨之类；还有一种地狱惩罚的死后报应，极为恐怖。其中一则说，买卖人秤高秤低坑骗顾客，死后被小鬼使秤钩挂了肋条，一桩一件拷问罪行。

按说，商人标价卖货，价格中已体现了利润，再在秤头上做鬼，而不是“斗满秤平”，那自然十分缺德。如有那样的地狱审判，阎王判官就该得诺贝尔奖，受到联合国荣誉嘉奖。不过，他们也将忙得屁滚尿流：世上有不沾腥的猫儿，可曾有不做鬼的商人？

儿时所听的故事有故事外的更深刻的意味。这样的故事有山乡老妪一代一代口口相传，说明我们的传统社会有这类故事得以流传的文化背景和传媒受体。

据说，周武王诛灭无道商纣，重新分封诸侯实施土地再分配，商族后裔显然得不到封赏。这一族遗民大约只能在交换领域贩卖一点钟鼎之类获得衣食。商人因而成为“商人”。

而准确的史实则是“汉承秦制”，秦汉时代商人地位低下，不得读书仕进，还不许穿华丽服饰，只能着白衣素冠。或曰：莫非吕不韦曾是商人而吕不韦和秦始皇的母亲睡过觉，秦始皇的

受过伤害的阴暗心理在作怪吗？事实上，任何历史都是若干偶然事件的综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任何偶然行为背后都含有若干的必然性。中国漫长而完备的封建社会从来都是建筑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基础之上。重农轻商，重农抑商，因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一条国策。明代郑和下西洋，航海历史如何早，造船技术如何高，令当今所谓爱国者津津乐道。孰不知，那宦官七下西洋明里只为向海外宣扬大明帝国天朝威势，暗中却是要寻访明太祖的孙儿建文惠帝必欲斩草除根。商务活动只成为一种附带行为，航海史上的壮举可悲地不曾有任何意义上的开拓扩张的色彩。数千年文明史以下，多少忠臣良相书之竹帛被群氓尊为神仙香火不断，有谁能举出哪位商人被如此推崇过呢？历来所传说的财神赵公元帅做过什么生意？时至今日，南洋华侨巨商所供奉的财神也是著名的关帝老爷哪！眼下，南风北渐，武圣人关羽在中国商界巨子们心目中之地位也正日趋显赫，各级电视台介绍山西解州关帝庙的节目不是已连连播放了吗？

前几年曾流传过“十亿人民九亿商”的说法，其实过分夸张了。比“十亿人民九亿赌，剩下一亿去跳舞”还要夸张。或者说，那句词儿太乐观了。中国式的商品经济或曰市场经济的体制远未确立，传统的坚冰远未打破，数千年的思维定势远未从根本上得到转换。以文化精英或文化先锋自居的理论家和作家们，改革开放以来，有过划时代的理论篇章和文学巨著吗？没有。随便翻检一下十年以来全国评奖的获奖作品，大大受推崇的倒是一些歌颂所谓传统美德的文章，是一些鞭挞“无商不奸”、“为富不仁”的文章。在这类作品和文章中，有描写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的现实的，但同时在描述中顽强地透露出对“两

极分化”的担忧和对“为富不仁”的担忧。这种担忧无论多么善良、多么富有人情味，其倾向性决难令人苟同。它们所流露的其实是对平均主义的“大锅饭”的深深的眷恋，是对“结果平等”的幻想和对“机会平等”的抵触。而这类作品描写近年遍及城乡的经商现象，那情景就更令人失望。凡经商的，必非良善百姓；凡发财的，必是奸诈之徒；凡“万元户”，他在作品中必须慷慨大方，必须帮助大家都富起来，否则他必定财大气粗、花天酒地、奸人妻女、霸人田产……作家笔下，这些人简直就是等同于旧社会的恶霸、工头、吸血鬼。中国之大，无奇不有，作家的描写肯定不乏生活依据。问题在于，作家从选材角度到叙述手段以及情感倾向，无形中描述了作家的“自我”，活画出了一颗骨子里极为传统的灵魂。自居先锋精英的作家的自身人格和商品经济应当创造出的现代人格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全新的观念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脑瓜里无中生有。当作家们的创作活动不曾介入市场，他们的作品还不曾成为经典意义上的商品，那么他们的价值观念还不会有彻底的更新。对他们，确乎不应期望过高，我们和他们，都只能期望在本质意义上的改革中来改变自身。

那么，在下忝列作家行当，赫然号称“一级作家”，有什么超常表演呢？说来惭愧得紧噢！

孩子们小时，管理和督促他们学习时我常爱讲：爱学不学，随便！大不了考不上学校去卖冰棍儿！话带几分调侃，信口道出。但信口道出的话，往往话中有真话。卖冰棍儿怎么样呢？没有老太太们在烈日下汗流浃地卖冰棍儿，热渴的路人找谁买那份儿凉快沁冷去？何况，老太太们冒了中暑的危险卖冰棍儿，当

然不是学雷锋。客观上无疑是“为人民服务”，主观上多半是“为人民币服务”。据知情人透露，一位老得快要嚼不动的老太太夏日旺季每天至少要赚五十来块呢！每月一千多元进项，哪一级干部和哪一级教授有这样高的工资呢？我省作家协会巷子外近几年辟为集贸市场，熙熙攘攘，司机们开车进出抵得上天天考车，周围百姓住户却买菜极其方便了。随便一个小摊位，每日进项数十元。被我戏称为“酱肉西施”的一位从姑娘成长为少妇的肉食亭女主人，几年来每日则要进项数百元。作家协会著名老作家马烽西戎等大师们，韩石山而张石山等知名中年作家们，谁个敢说比“酱肉西施”更阔呢？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卖酱肉那么挣钱，有哪位作家肯开一片酱肉店戳在马路边上去练摊儿吗？没有。号称“非常之人敢为非常之事”行为举动不守常规俗例的张某人，也没有。放不下不知何时端起的这份儿架子。数十年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改造知识分子运动，并不曾真正改造了知识分子，说来荒唐，想来可笑。传统观念“唯有读书高”之类是那样的强固，大家“冻死不下驴”，干脆做寒士而歌颂清贫。穷而有志，贫而清高，多伟大哪！

有许多年了，报章杂志首长讲话乃至红头文件，再三反复强调呼吁号召重视知识分子，要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云云。这首先证明，知识分子历来未受到应有重视，地位低下甚至打在另册之中。其次，要“提高”而要“重视”无疑存有一种“恩赐”心态，可悲的是即便是恩赐也不曾兑现多少实惠。古远的史实不必一一列举，单是解放前的“万恶旧社会”时代，一些事实可以给我们若干的启迪思索。阎锡山土皇帝统治之下，军队士兵津贴副兵每月六元大洋，正兵每月七元；工厂熟练技工

每月薪饷二三十元；而一名小学教师的工资可达每月五六十元，大学教授则每月大洋二三百元！知识分子着长衫而摇羽扇，啜香茗而饮美酒，食有鱼而出有车，世人尊敬而自感斯文，他们的社会地位又何须什么人喋喋不休去号召提高呢？

我的意思自然不会被误解为怀念旧社会，毋宁说是希望温故而知新，着眼于未来。哀叹“造导弹不如卖鸡蛋”乞求恩赐毫无意义，上帝救助那些自助者。眼下，深圳海南等特区传来了不少高薪聘用和巨资厚奖知识分子的消息，这同样不是什么人的恩赐。知识分子用他们的知识为社会创造许多显见的和预想的利润，他们理所当然地应该获得报酬，市场需要他们，他们在市场机制下真正显出了实际的价值。

至于卖文为生的作家这一类知识分子，情况略有不同。由于强调宣传功能，他们的作品尚未成为经典意义上的商品，稿费始终很低而版税制度从来不曾确立，呕心沥血写作出版的文章不能换回合理的报酬。鄙人创作十余年，有幸两次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一次奖金200元，第二次奖金500元。告诉许多大企业家朋友或练摊儿的伙计，大家认为我在骗人。在他们心目中，我不仅是能写书的大文豪，更早已是百万富翁了。

我出身贫农生在卖苦力挣钱的家庭，对工人农民有一种永远割舍不断的血肉感情，但我决不排斥清高和斯文。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受苦汉家族巴望能够改换门庭。奋斗有年，作家名声播于娘子关外千百里远近，然而我难称清高够不着斯文。罗锅儿上山，只是钱紧。不曾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倒笃定加入了穷下去的一部分。希冀短时期内有文件大幅度提高稿酬标准，写一本书而一夜之间暴富，那是公鸡下蛋，秃子的毛它也不长咱也不想。所幸政策日趋宽松，允许人们搞第二职业。